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我们今天如何开展消除生态危机的斗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J·B·福斯特给予的启示

陈学明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美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J·B·福斯特深刻地批判了当今社会所存在的生态危机, 他认定造成当今世界陷入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的最终祸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更确切地说, 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 他所指出的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 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

[关键词] 生态危机 生态文明 生态马克思主义

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J·B·福斯特无论是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 还是对当代世界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 说到底就是为了探索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道路。由于他认定造成当今世界陷入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的最终祸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更确切地说, 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 所以他所指出的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 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那么, 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具体地展开这种对抗呢? 下面我们有针对性地选择他所提出的若干概念、命题和判断加以剖析。

## 一、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

J·B·福斯特指出, 当前人们常常受那些忠诚于“利润和生产之神”的煽动者的引诱, 转移我们的视线, 一方面使我们产生生态危机并不那么严重的感觉, 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把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与现行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 相反“还把导致全球环境恶化的现行经济体制作为解决它所带来的所有问题的希望所在”。在这种情况下, 要摆脱生态危机就要“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 也就是说, 把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的本性揭示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to require a form of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即“对进行掠夺性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sup>①</sup>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拒不承认这一事实。“社会的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地无视当今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无一例外地无视为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彻底地对当今的生产方式进行改组的必要性。他们把力主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 对改善周边生活质量的呼声充耳不闻。”<sup>②</sup> 在“统治集团”的率领下, 企业明明为了追求利润在损害着环境, 却还是

[收稿日期] 2010-03-22

[作者简介]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文是下述研究项目的成果: 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研究”(项目批准号: 02JAZ-D720006); 教育部应急委托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 2008JW018); 上海市重点学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①② 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 25 p 254

那么地自鸣得意,努力地“塑造自己对社会负责,善待环境的形象”。而一些科学家和学者也常常为了某种利益违背信念,为“统治集团”和企业的一些明明是无可辩护的事物进行辩护。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观念,需要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正本清源,需要进行“知识性抵抗”。

J·B·福斯特认为进行“知识性抵抗”时最重要的是要把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揭示出来,必须摒弃一些人惯用的从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的角度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的做法,要在这些因素之外去解释为什么当今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这就是说,应当把矛头指向“当今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数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思考,他们的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在他们那里,“预示未来灾难的恐惧与劝说逃避灾难的温和形成了鲜明对照”。<sup>①</sup>这些人对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有着足够的估计,他们一描述起人类未来的生态灾难来总是展示着恐怖的前景,但谈及如何逃避灾难时又是显得如此地温和,其要害就是不愿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走上进行“知识性抵抗”的道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结合资本积累的知识来分析生态发展态势,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他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投资不扩张,利润不增长,它就要面临死亡。人类进入了21世纪,无数的事实已告诉人们,按“唯利是图”的原则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自然发生冲突”。如果不用这样一种“抵抗性的知识”武装当今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完全成为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 二、超越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

J·B·福斯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一条“基本的底线”,这就是一切为了谋取利润,能赢利就干,不赢利就不干,他把此称为“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the bottom line of the money-driven economy)。他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当今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sup>②</sup>在他看来,要真正进行保护环境的斗争就必须超越这一盈亏底线。“保卫环境最终需要与底线的专制决裂并进行长时期的革命(我们希望这一革命的时间不要太长,希望与生态变革相关的历史进程能够加速),正是通过这一革命,越来越多的与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不相同的价值观会涌现出来。”<sup>③</sup>只有超越了这一盈亏底线,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将是一种根据直接生产者的需求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注重满足人类的整体需求的生产体制。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必须与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倘若生产能以促进全人类福利的方式促进个体福利,并且以可持续性亦即非掠夺性方式对待自然、满足人类需求的话,那么这种生产就可以说不会发生异化。”<sup>④</sup>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底线就是“满足人的整体需要”。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相应地也有着两种不同的底线: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以获取利润为底线;其二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以满足人的整体需求为底线。在J·B·福斯特看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当今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改变生产目的,即从为了谋取利润而生产变为以满足人的整体需求为宗旨的生产。而这种改变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积累逻辑、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他说:“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达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这就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sup>⑤</sup>

J·B·福斯特认识到,这种对“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的超越在当今社会中是异常艰难的。关键在于,以盈亏作为底线实际上是“以金钱作为成功的标准”,而“以金钱作为成功的标准”已构成

①②③④ 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74 80 40 40

⑤ J·B·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Monthly Review 58. 9 (2007): 12

了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中得到如此高度的“制度化”,所以几乎“显示不出任何不道德的本性”,而“所有其它道德标准和共同体规范被迫在它面前让步”。<sup>①</sup>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已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它是所有幸存事物的基本物态,同时也是所有事物的社会产品”。<sup>②</sup>J·B·福斯特认为,对“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的超越必然要触动“金钱至上”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其艰难性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革命。

### 三、以人为本

J·B·福斯特在论述建立一种以满足人的整体需求为旨的新的生产方式之时,提出了“以人为本”(putting people first)的命题。在他看来,在展开保护环境的斗争时,最重要的是必须牢记“以人为本”。他这样说道:“必须以人为本,尤其是以穷人为本,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当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至关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sup>③</sup>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包含着对“以人为本”这个命题的深刻阐述。首先,“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生产为本”,甚至“以环境为本”而言的。人与生产相比,人是目的,生产只是手段,不能为了生产而生产,更不能为了谋取利润而生产,生产应当始终围绕着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其次,“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可以分析的,这里所说的“人”当然首先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人,即指的是全体的人,但这样认识还是不够的。J·B·福斯特强调,这里所说的“人”尤其是指广大的“穷人”,广大处于低层的人民群众。由于生态遭到破坏,受害最深的就是这些“穷人”,所以在致力于进行环境保护的斗争时首先应当关注这些“穷人”的利益。事实上,展开环境保护的斗争就是要解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从而以“穷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是这场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以人为本”究竟以人的什么为本?J·B·福斯特讲得也十分清楚,“以人为本”是以人的需求为本,但这里所说的需求是指人的基本的、自然的、整体的需求,而不是那种由消费社会强加于人的“虚假的需求”,例如无止境地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

J·B·福斯特强调:“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来保护环境。”<sup>④</sup>我们只有真正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才能有效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其中一个理由是,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可以减少环境破坏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没有直接风险的人来说更应如此”,在J·B·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握有生产资料、拥有资本的人,确实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而且往往是“直接风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广大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穷人”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要比这些资本家小,但是这仅仅是就“直接风险”而言,一旦涉及“间接风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实上,如果把“间接风险”也包括在内,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穷人”带来的风险远甚于给“富人”带来的风险。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有效地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穷人”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环境方面的风险。在J·B·福斯特看来,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由于环境保护运动往往不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公开地提出争取环境公正的目标,从而常常不为这些人所接受,不能与这些人走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以人为本”改为“以穷人为本”,将争取环境公正的原则引入环境保护运动,那么就可以把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与争取环境公正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都统一到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运动中。

### 四、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J·B·福斯特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存在着生态环境完全被毁灭的可能性,“这与核军

①②③④ 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88 88 49 50

备批评家常常说及的人类面临彻底核毁灭实际上具有同等意义”。可是,为了消除这一危险,人类相应采取的社会行动却进行得异常缓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神圣的自由不可侵犯”这一观念在起着作用。一些人总以为,“提供环境保护,恐怕要限制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自由,以及限制个体追求自身直接物质利益的自由”。<sup>①</sup>这些人正是在维护人类自由的观念下抵制环境保护。就这样,“我们当今的社会秩序已经陷入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的圈套,这与生态规律是直接相冲突的”。<sup>②</sup>人们把所谓的人是绝对自由的观念引入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中,形成了自由同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一种机械论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阻碍着人们对环境的保护。面对这一情况,他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目前人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观念之所以必然是反生态的,关键在于这种自由的观念是与极端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自由纯粹是个人的自由。按照这种个人主义自由观,个体是独自分离的,并且必须首先自我照料。个人与个人之间完全是竞争关系,并且人人都想成为赢家。由于人们把世界看作是由众多微小单位所构成的,而且都把开发每个单元视为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必将以地球的毁灭而告终。他这样说道:“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概念,不愿承认‘个人忽视他人需求’乃是非理性的,不愿正视世界并不是‘由众多微小单位所组成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sup>③</sup>J·B·福斯特强调,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观念,这种使人“欲壑难填”的“经济人”概念,确实给人类更充分地支配自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人类在获取这种自由的同时,我们的环境也被这种自由吞没掉了。“只要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环境实施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结果。”<sup>④</sup>当人们不能在社会中获取这种所谓绝对的个人自由之时,就设法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时充分实现这种个人的绝对自由。人们一方面使自己,即抽象的自我“摆脱了所有物质内容,只留下把天地间的一切都转化成自我保护手段的企图”,另一方面“又把空洞的自然贬低为被占有的物质,被随意支配的东西”,“而除了这种纯粹的支配之外就别无他图了”。J·B·福斯特强调,这种自由实际上是“具有强烈占有欲的个人主义者的人类工具主义”的同义词,正是它成了“我们社会中导致环境破坏的主要根源”。<sup>⑤</sup>

J·B·福斯特批判这种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观念,是为了推出另一种新的自由观念。他提倡实施一种“普遍的、整体的自由”,并在这种“普遍的、整体的自由”的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to construct a human relation to nature that is based on “freedom in general”)。他所说的“普遍的、整体的自由”大致说来包含三层含义:其一,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指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而更是指作为整体的人的自由;其二,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而是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其中当然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联系;其三,这里所说的自由并不是与手段完全对立的,并不是为了实现这种自由而可以不择手段,而是强调手段与目的的相对性和一致性。在他看来,为了拯救地球,唯一的出路就是与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观念相决裂,而崇尚整体与普遍的新的自由观念,与此相应,与植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相决裂,转而构建以这种新的自由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体制。

## 五、够了就行,而不是更多

J·B·福斯特注意到,“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自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峰会以来已广为流传,耳熟能详。但与此同时他尖锐地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逐渐形成的共识,掩盖着更多的重要分歧。”<sup>⑥</sup>关键在于,“可持续发展”概念尽管与环境保护有着众多的联系,但在许多人那里,它“主要还是一个为狭隘的经济目的服务的经济概念”,“可持续发展”实质上等于

①②③④⑤⑥ 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52 52 53 58 58 79

持续的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发展”的这种理解往往通过“坚持环境的成本需要市场内化”的观点而与一些生态思想趋于一致,确保“自然资本”的损失能够用增长或发展的方法计算出来。J·B·福斯特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可持续发展”只是指经济的持续增长、消费的持续增长,那么即使在“发展”前加上“可持续”这一限制词,也不能消除发展给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关键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sup>①</sup>

J·B·福斯特认为,当今急需对“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这些概念加以批判性的重新审视。“对那些主要关注地球的持续和建立适合居住的可持续性共同体,而不是通过持续发展来提高利润的人们来说,他们很可能更加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sup>②</sup>在他看来,在审视这些概念之时,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的不相容性。必须承认人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需要向地球索取资源并且排放地球必须消化的废料,从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环境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处于贫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仍然是必要的。关键在于,要对发展,特别是对“可持续发展”有正确的认识。人们必须对下述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当今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相一致?在资本主义的积累制度——即为了利润和资本而进行生产的制度——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刻,讨论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J·B·福斯特对此做出的回答是,首先不能把发展只是理解为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即应当是不与环境保护相冲突的发展。单纯经济的发展只是一种“畸形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发展的“畸形”取向,应当让发展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发展一旦成为社会的综合发展,那么它就不再与生态相冲突。其次,即使是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无限制地发展,而应讲究适度。发展不能归结为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但发展无疑也包括了经济的发展。“新的发展形式必须注重适可而止,而不是更多”,<sup>③</sup>即够了就行,而不是更多(having enough not having more)。经济的发展应当“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如果基于这一考虑,那么在发展经济时就不会相信“越多越好”了。只有适可而止,才既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又能确保长期的安全。J·B·福斯特指出,在这里还必须消除一个误会,即认为只有发展生产,追求经济的高增长,才可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可这一早已为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所接受的古老真理:发展生产本身并不能消除贫困。”<sup>④</sup>生产发展了,经济增长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如果社会财富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而无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这种发展和增长就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而这正是在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发生的事。

## 六、将土地伦理付诸实践

J·B·福斯特认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的“居所感”的丢失。在大部分人类历史进程中,社会是以“生态系统文化”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某种特定的生态系统或若干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居住条件。那时,人类对大地、对生态环境有着强烈的依附感。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随着人类摆脱了生态系统的束缚,随着“支配自然”成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人类的“居所”急剧消失了,而“居所的急剧失落,也就是对地球某一地区的依附感的失落”,<sup>⑤</sup>人类终于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变成了无家可归者。这一点,到了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今人们的那种无家可归感与日俱增是“与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含的生态帝国主义倾向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的”。J·B·福斯特指出,正是自然和人类关系上的掠夺模式,带来了所谓地球的“所有权的缺失”。与生态帝国主义发展始终相伴的就是人们把地球作为居所的那种情感遭到破坏,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的“居民”被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所取

①②③④⑤ 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82 79-80 80 81 85

代,人成了贝里所说的“流浪的君王”。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 J° B° 福斯特认为确实有必要思考一下建立“土地伦理”的可能性的问题。人类必须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以取代目前对待环境不道德的做法。“确实地说,人类必须重新学会如何在地球上居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sup>①</sup>当今存在着人类只生活在消费场所而不是生产场所的幻觉,误以为可以视自然为“外部环境”,即只是“从中索取资源并向其倾倒废料的区域”。我们只有建立起新的生态道德,才能消除这一幻觉,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把自然视为我们人类的“外部躯体”,视为我们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土地是生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也可以把生态道德称为“土地伦理”,重要的是“将土地伦理付诸实践”(putting land ethic practice)。J° B° 福斯特认为“土地伦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维护土地的“权利”,而不让人类滥用它。当今人类破坏生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滥用土地,而之所以可以滥用它,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们将它视为自己拥有的商品。但倘若我们把土地视为“我们归属的共同体”,那么我们会“怀着爱戴的心情对待它”。J° B° 福斯特强调说,“土地伦理”实际上是要扩大“土地共同体”的范围,把土壤、水源、植物、动物这些统统包括进“土地共同体”的范围。“土地伦理”并不是要限制对这些包括在土地范围内的“资源”的变更、管理和使用,问题在于,在变更、管理和使用它们时“必须确保其继续存在的权利,至少是在其居所之上以自然状态存在的权利”。“土地伦理”就是要改变当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使其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成它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既要尊重同类,同时也要尊重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他非常欣赏 N° 乔姆斯基所说的:“倘若我们仍旧认为我们只能按照个人贪婪和私利行事的话,那么[生态的]共同体将必然遭致破坏。要想使后代人也能继续生存与发展,人类必须提出新的人性价值观。”<sup>②</sup>

## 七、自然的社会化

J° B° 福斯特强烈地批评自然的私有化。他这样说道:“假如作为人类与地球基本联系的土地蜕变成最高出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买卖的纯粹地产,如果可以将公地围圈,然后不受任何公共制约和限制随意开发,那么就注定会导致一切都蜕变为经济价值。”<sup>③</sup>既然土地可以成为私有的东西,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成为私人的东西呢?从而一旦土地私有化了,可以任意开发了,那么整个自然的保护也将成为一句空话。J° B° 福斯特认为,把自然私有化是与把自然资本化联系在一起的。而把自然和地球描述为资本,其主要目的无非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价值而对自然进行掠夺的现实。而将自然资本化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实际上,如果真正到了将自然完全资本化的那一天,那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然资本的净积累”,人们所看到的也只是“随着华尔街的行情变化,不断将自然转化为金钱或抽象的交换”。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然的彻底毁坏。他认为,把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给“地球定价”,这几乎无异于“把经济扩张主义与自然同一而语”。人类是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成本都内化到一种“创造利润的经济环境”之中去的,因为“要在私有市场结构中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是不可能的”。只要想一下“土地成本的上涨从未中断过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观的水泥硬化”,这一点就一清二楚了。

与自然的私有化相对立, J° B° 福斯特提出了自然的社会化。他在其著名的《脆弱的星球》一书中首次呼吁实现自然的社会化。他的这一著作的最后一章就起名为“自然的社会化”(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他指出,无数的生态斗争的实践都证明了人类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即被一些环境学家称为“自然的社会化”的历史过程。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人们终于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对付“与日俱增的环境的衰落”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的破坏”,必须维护“享受公

①②③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86 90 88

共自然利益的人类权利”。要想保护植物、动物、土壤，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集中化管理”才有可能。这就导致尽管生态斗争可能在许多层次上展开，但是“聚焦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改变把自然作为可以任意开发的领域，而把它置于公共的保护之下”。<sup>①</sup> 他所说的“自然的社会化”的实质就是把自然“置于公共的保护之下”。他强调，“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环境就越是受到切实的保护；相反，如果“把自然交给资本”，那就必然“忽视可持续性这一集体目标”，必然为“对自然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sup>②</sup> 在他看来，在我们面前两条道路泾渭分明：其一就是把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这样，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丧失了保护自身和自然的能力；其二是把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置于公共领域，那么“我们可以把包括保护自然在内的一切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sup>③</sup> 而我们只能走第二条道路。他说，那些私有化的拥护者对“社会化”存在着极大的偏见，他们总是把“社会化”与苏联极权主义的“国有化”相提并论，他们总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化”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人们完全可以创造一种并不是跟民主相对立的、与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的“国有化”不一样的“社会化”的新形式。“在这个人人都皆知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时代，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现在所享用的许多物品，从自来水到电力、公共卫生设施、公园等，最初都不是由私人公司提供的，而是由对民主要求做出呼应的那些公共机构提供的。”<sup>④</sup>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由这些民主的公共团体发起和实施”“自然的社会化”，从而推进环境的保护呢？

## 八、环境革命必然引起社会革命

J·B·福斯特认为，由于人的劳动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所以自然的社会化只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相伴随才能得以完全实现。在这一意义上，“环境革命必然会引起社会革命”（*environmental revolution necessitates social revolution*）。<sup>⑤</sup> 只有通过生产和自然进行民主的、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管理，世界才有希望被人类共同地关心，我们后代的利益才有希望得以延伸，自然才有可能不至于被那些个人只是出于短期的目标而肆意地开发。J·B·福斯特极其强调生态斗争与社会斗争的一致性。他借用 G·里科韦的话说：“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而环境恶化也就是人类关系的恶化。”<sup>⑥</sup> 在他看来，记住 G·里科韦的这一告诫是十分重要的，人们把生态问题归结为环境公正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殊不知为争取环境公正而进行的斗争与消除社会不公正的斗争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社会的公正就没有环境的公正，不消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就不能消除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恶化，不解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剥夺问题就不能解决人类对自然的剥夺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的不公正，而且还有环境的不公正，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以社会的不公正，而且更要以环境的不公正作为理由来反对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中心，不仅存在着尖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怕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生态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分离”。<sup>⑦</sup>

J·B·福斯特并不讳言，生态斗争实际上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关键在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存在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所能实现的。它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社会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超越现行的资本积累逻辑”。<sup>⑧</sup> 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

①⑤ J·B·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141—142 142

②③④ J·B·Foster interviewed by D. Sora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26. 6 (2004)

⑥⑦⑧ 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81 82 101

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在所难免。J·B·福斯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看一看“当今的许多著名的环保主义者都自称对自己所开展的运动采取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sup>①</sup>是显得多么苍白与虚伪!想把环境保护运动置身于传统的阶级斗争之外,想羞羞答答地接受“我们已看到敌人,这就是我们自己”之类鬼话,想把环境问题只是归结于消费者的习惯、婴儿的出生率等,都是一种把生态运动引入歧途的企图。进行生态斗争最重要是要牢记:社会中是存在阶级和派别的。J·B·福斯特通过对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详尽考察得出结论:“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性”,“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正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sup>②</sup>他所要表述的主要观点是:如果环境主义者坚持那种所谓超阶级的立场,那么“他们只会把工人推入资本的怀抱”,“为了在政治上取得效果,为了与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建立联系,他们必须面对阶级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工人阶级,倘若环境运动者过多地将自己定位于中等或上等阶级,或者完全忽略阶级问题,认为雇佣工人的命运应该留给市场决定,那么,环境运动就不可能走得很远”。<sup>③</sup>他说,在进行生态斗争时应当毫不含糊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所谓生态斗争,其主要内容就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生产关系”,<sup>④</sup>也就是使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寻求交换价值”,“不是以利润为目的”,“而是为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服务”。<sup>⑤</sup>显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主义。他说,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它应当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之上。有一点可以确信,我们通过生态斗争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sup>⑥</sup>

## How to Eliminate Ecological Crisis? — The Enlightenment from Eco-Marxist J. B. Foster

CHEN Xue-mi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Studies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J. B. Foster, an American eco-Marxist, has criticized ecologic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world. He believes that the ultimate scourge which has incurred deep ecological crisis is Capitalist system, exactly Capitalist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so the way of eliminating ecological crisis is to struggle with Capitalism and especially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n, how to struggle with th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at shall we do? What J. B. Foster has done is jus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He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judgments, and this paper chooses some typical ones to clarify his views.

**Key words** ecological crisis; eco-civilization; eco-Marxism

[责任编辑 晓 诚]

①②③④⑥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104, 104, 10, 102, 168.

⑤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174.